

■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先秦两汉

巴蜀书社

译注 陈世饶

审阅 董治安

左传选译

556173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左传选译



本书责编：梅锦辉
封面设计：陈世五
版面设计：盛寄萍

·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
(第一批50种)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巴蜀印刷厂
1990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套

ISBN7-80523-357-8/Z·27
定价： (50种) 130.00元

译注

陈世饶

审阅

董治安

包氏书局

一九九〇年出版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69/36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

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记述完整的编年体史书，也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散文巨著。《左传》全书约十八万字，用鲁国十二位国君（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的世次，按年月顺序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722——前468年）总计二百五十四年间各诸侯国的重要史实。从汉代起，《左传》就被列为儒家经典。到了唐太和（公元827——835年）年间，唐文宗下令把《左传》跟《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等一起镌刻上石，立于太学，称为《十二经》。到了宋代，又加列《孟子》，合称《十三

经》。因此，《左传》一直是古代士人们必须熟读的书，它对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史学和语言文学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直到今天，它对研读中国古代历史和先秦语言文学的人来说，还是一部必读的著作。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人认为它是一部解说和阐述《春秋》的著作，改称为《春秋左氏传》。《春秋》本来是春秋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墨子·明鬼》就记载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孟子·离娄下》也说：“晋之《乘》、楚之《梲杌》、鲁之《春秋》，一也。”这说明当时文化比较发达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国史。当时的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两季举行，所以就从“春夏秋冬”四季之中，摘取“春秋”这两个字，作为国史的通称。到了战国末年，各国的《春秋》都先后失传了，只有一部《鲁春秋》传了下来，《春秋》就成了《鲁春秋》的专名，儒家尊它为《春秋经》。

流传到现在的《春秋经》一共有三种本子。一种是《左传》的讲解本，叫《左氏经》，它最初是用秦以前的文字写的，又称古文经；另外两种是《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讲解本，叫《公羊经》和《谷梁经》，它们是到了西汉初年才用当时通行

的隶书记录下来的，又称今文经。三种经文大体相同，而其中也有些差异。比较重要的差异是《公羊经》和《谷梁经》都只记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西狩获麟”止，而《左氏经》却记到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止。另外，《公羊经》和《谷梁经》都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年）记了“孔子生”，《左氏经》里却没有这一条。

《春秋》是我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虽然用鲁国的纪年，所记的却是各国的事，所以也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根据一些专家的研究，《春秋》全书记载日食共三十六次，其中除了两次可能因错简或误记的以外，其余三十四次都跟现代天文学的测算吻合，这是古人不可能伪造的。另外，后代出土的青铜器皿和其他历史文物，也多能跟《春秋》的记载互相印证。这说明《春秋》是一部可信的史书。

《春秋》的作者，战国和两汉的人都认为是鲁国的孔丘。《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记·孔子世家》也说：

“孔子作《春秋》，笔（记载）则笔，削（删除）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但近代的学者大多认为《春秋》不过是鲁国历代史官递修而成的鲁国国史。因为修史本是太史的职责，也只有历代史官

才有可能掌握这样丰富的原始资料并加以记录；从《春秋》二百四十余年的“书法”（记事原则）和文风来看，前后颇有不同；详细记载孔子平生言行的《论语》，也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大约是在鲁哀公之世，礼崩乐坏，史官和乐师流散四方，官府的典籍也随之散亡出去，学术下移，孔子因而有机会把《鲁春秋》作为教本传授弟子。孔门弟子为了纪念孔丘，才在《春秋经》里记上孔子生年（见《公羊经》和《谷梁经》）和卒年（见《左氏经》）。

《左传》和《春秋》本来是另本单行的著作。到了西晋，杜预（222——284）才把《左传》按年分开插编在《春秋》的每年之后，并且参汇前人的训释作了注，称为《春秋经传集解》，这是《左传》的注释本流传下来最早的一种。到了唐代，孔颖达（574——648）为杜预的注作疏，再附上陆德明（约550——630）《经典释文》中的《左传音义》，就成了今天我们从《十三经注疏》中看到的《春秋左传正义》。

《左传》的作者是谁？这个问题历来争论最多，到现在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看法。西汉人认为《左传》是跟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

（求）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记载历史的书）旧闻，兴于鲁而次（按顺序编写）《春秋》。……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跟正统的学说不同），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指《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也有相似的记载。这位左丘明，《论语·公冶长》曾记载孔子心怀敬意地提到过他。“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可见他至少是与孔子同时，还可能是孔子的先辈。但是，说《左传》成于左丘明之手，矛盾太多，不能使人相信。比如《左传·哀公二十七年》附记孔子死后二十六年（前453）智伯被灭的事，又称赵无恤为襄子。赵无恤死后谥襄子（前425），是孔子死后五十三年的事。《左传》还好作预言，象三家分晋（前403）和田氏代齐（前386）这样的预言，分别在孔子死后七十六年和九十三年才得到应验。这些都是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不能预知，只有后来亲见或亲闻这些事情的人才有可能写出来。因此，关于《左传》作者就有种种说法：有说是作于“楚左史倚相之后”（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有说是西汉末的刘歆（？——23）割裂《国语》，比附经文而成（康有为《新学伪经

考》)；有说是战国时的军事家卫国左氏人吴起（?——前381）纂集各国的史传而成，“以其乡邑为名，故冠其书以‘左氏’。”（郭沫若《青铜时代·述吴起》）；有说是左丘明所作而“后人屡有附益”（姚鼐《左传补注序》）。这些说法都有较多的臆测成分，缺乏确实有力的证据。其实，先秦的典籍很少是由个人执笔写成的，大多由各学派的门徒不断补充、发展，经历若干年代才成为定本。从《左传》本身的内容和先秦著作成书的一般情况来考察，我们以为《左传》很可能是由鲁国历代的史官用口头传诵的方式来解说《春秋》，经过若干年代的提炼和增补而逐渐丰富起来，这当中还采汇了列国的国史资料和其他文籍。到了战国初年，才有弟子根据老师的口传，有意识地按《春秋》的体例和纲目写成传记。古代史官分左史和右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弟子们以祖师的左史之官来命名，就称之为“左氏”。这跟《公羊传》和《谷梁传》都是先有口传而后成书的道理是一样的。《左传》中征引孔子和别的“君子”对人物和事件的评论，大约就是孔门弟子在传述过程中为了“惩恶劝善”而加进去的。书中还有对同一事件而作了两种不同的记载（可参看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第二章），应该是所取资料来源不同而留下的痕迹。但

是，不管《左传》作者是谁，能不能确切认定，都无损于它在中国史学和文学上的伟大成就和价值。《左传》最后成书的年代，可以确定为战国初年，即公元前四世纪的前半叶。战国晚期它已流行于中原地区，当时的文籍，象《战国策》、吕不韦（？——前253）门客纂集的《吕氏春秋》、韩非（约前280——前233）的《韩非子》，都征引过《左传》的文字。到了西汉，司马迁作《史记》，刘向作《说苑》和《新序》，征引《左传》的材料就更多了。

《左传》作者在叙述历史事件、记载古人言行的同时，也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流露爱憎的感情，表明了自己的倾向。从思想内容来说，其积极的一面是主要的。这首先表现在对待天人关系的态度上。在春秋时代，天命鬼神有极大的权威，奴隶主贵族正是凭借着天命和鬼神来维护他们在人世间的统治。当时的一些先进人物，针对有神论的天命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们虽然还不敢直接否定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已经明确地把它们放在附属地位，而把人看成决定命运的主体。例如，魏君派太史嚭去享神，太史嚭说：“魏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一心依凭于人）者也，依人而行。”（庄公三十

二年) 虞国宫之奇劝谏虞君说: “鬼神非人实亲, 惟德是依。” (僖公五年) 宋国坠下五块陨石, 宋襄公问这件事的吉凶, 周内史叔兴说: “吉凶由人。” (僖公十六年) 鲁国的穆叔引《大誓》说: “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 (襄公三十一年) 这些言论, 实际上是对天命和鬼神作用的否定。《左传》记录下来, 并且流露了赞许的倾向, 这在思想史上是一大贡献。

其次, 表现在对待君民关系的态度上。《左传》重视民的地位和作用, 把“得民”看作立国的根本, 看作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 因而主张“养民”、“勤民”, 反对“艾杀其民”, 反对过分盘剥和役使百姓, 表现了初期的民本思想——随着奴隶制度的没落和人民力量的显示而产生的一种重民思潮。卫国人驱逐了暴虐无道的卫献公, 晋侯认为这太过火了, 师旷却评论说: “良君将赏善而刑淫, 养民如子”, 如果象卫献公那样使百姓绝望的君主, 不赶走他干什么? (襄公十四年) 楚国在城濮之役中战败, 楚国的荣季说: “非神败令尹 (指子玉), 令尹其不勤民, 实自败也。” (僖公二十八年) 齐崔杼杀齐庄公, 晏婴不肯为庄公殉死。他认为: 做国君的不能凌虐百姓, 而应当搞好国政; 做臣子的不是为了俸禄, 而应当报效国家。 “故君